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漢紀》與袁宏之史學及思想／卓季志 著 -- 初版 -- 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18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編：第 8 冊）

ISBN：978-986-6657-15-3（精裝）

1.（晉）袁宏 2. 後漢紀 3. 學術思想 4. 史學

5. 研究考訂

622.202

97000995

ISBN - 978-986-6657-15-3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6657-15-3

《後漢紀》與袁宏之史學及思想

作 者 卓季志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八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後漢紀》與袁宏之史學及思想

卓季志 著

作者簡介

卓季志，1974年生，臺灣臺北縣人。臺灣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暨歷史學系畢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畢業。現任教於臺北縣私立樹人家商。

提 要

今本《後漢紀》是一部尚稱完整的斷代史文獻，此書早於范曄的《後漢書》成書問世，從研究後漢史的立場來看，應有重於《後漢書》的史料價值性。可是《後漢紀》歷經一段被輕忽的時期後，雖然現今存本大致上完整，但是內容已有些許脫誤，而且史事記載也與他書有諸多殊異。本文研究從《後漢紀》的內容重新審定這部歷史文獻對於後漢史的史料價值，並且檢視袁宏編撰這部史著在中國史籍編纂學與史學史上所蘊含的意涵，分析其指導撰史的思想意念，以對《後漢紀》與作者袁宏有整體而深度的認識。

根據本論文研究的主題與方向，按史料、文獻的內容分類，由核心向外分別為「各本《後漢紀》」、「其他古籍相關史料」、「《後漢紀》的校勘與研究」、「袁宏相關研究」、「中國傳統史學與思想相關論著」及「其他相關文獻」等等。研究《後漢紀》得與相關的其他古籍文獻相互參校，以核對或補正史事的內容，從而找出《後漢紀》記載的獨特之處。至於與袁宏相關之研究、與中國傳統史學及思想相關的論著，以及其他相關的文獻等等，藉資前人研究成果輔助本論文更精確地探索《後漢紀》的價值與意義。

研究方法上，首先運用文獻學方法探討《後漢紀》的傳行與其史料價值，對《後漢紀》所記載的後漢史事作全面性的分析後，再進一步深入探討其內在意涵，如史籍創作的條件、作者運用的方法，甚至作者的創作思維及思想蘊含等。在探討這部史籍以上的諸多面向，採多種研究方法交互運用，以歷史研究法為核心，研究過程中時時善用分析方法與綜合方法，再佐以歷史比較方法與心理分析方法。

本文以《後漢紀》為研究主體，從中國史部文獻發展史的角度切入，探討一部史籍的傳世與價值。蔣國祚、陳璞、鈕永建等清代學人，以及近人周天游、張烈等皆已致力於此書校考工作，筆者藉助前人的成果，進一步分析《後漢紀》所記載的史事，探討這部後漢斷代史籍的文獻價值。接著，筆者從中國傳統史學發展史的角度，討論到東晉時期如何誕生一部編年後漢史，從《後漢紀》裡找出魏晉史學的元素，檢視《後漢紀》中的史學內涵，以及身為一時文宗而著史的袁宏其史學素養的層次。最後，則再深入作者的思想層面，從《後漢紀》中探索作者袁宏所灌注其中的思想，甚至將觸角延伸至魏晉整個時代思想觀念的影響因素。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回顧	7
三、研究目的與方法	17
四、章節綱要	20
第二章 《後漢紀》與其史事	21
第一節 《後漢紀》之傳世	21
一、北宋大中祥符前《後漢紀》的傳行	22
二、刊而不傳時期	26
三、明嘉靖以降的復甦	27
第二節 《後漢紀》之史事疑議	30
一、數字與時間的錯誤	31
二、身分職務的錯誤	34
三、輿地與史事內容的錯誤	39
第三節 《後漢紀》對後漢史之價值	42
一、漢末事記載詳盡	46
二、存異史文	48
三、補《後漢書》之不足	49
四、獨存的記載	52
第三章 《後漢紀》之編纂	61
第一節 二體交游	62
一、編年體的變革	63
二、兩晉時期二體關係	68
三、《後漢紀》與「新式編年體」	72
第二節 史法體例	77
一、體裁規則	78
二、體例問題	85
三、編纂方法	89
第三節 盛興的史論風氣	92
一、兩晉前史籍史論發展	93
二、史論的文體與內容	96
三、《後漢紀》史論	98
第四章 《後漢紀》之思想	105
第一節 政 論	105
一、論人治	107

三、論政策與施爲	117
第二節 「務飾玄言」析論	123
一、名理與自然	124
二、性之異別與應世之道	127
三、袁宏之謙論與《易》學	129
第三節 以史明玄——「通古今而篤名教」之思想內涵	134
一、建構史玄關係	135
二、今不如古——久失名教之義	137
三、以史爲憑、篤行名教	142
第五章 結 論	151
一、《後漢紀》版本的擇取與運用	151
二、學術藩籬未定下的史學家	153
三、玄史相輔、通史致用	154
徵引書目	157
附 錄	
附錄一：周天游《後漢紀校注》勘誤表	167
附錄二：張烈點校《後漢紀》勘誤表	183
附 表	
表 1-1：書志中可見之後漢斷代史籍表	2
表 1-2：參校《後漢紀》佐引文獻表	18
表 2-1：《後漢紀》各刊、寫本表	29
表 2-2：永元九年至十四年司空職異動表	36
表 2-3：《後漢紀》獨存詔令、策命史料表	54
表 2-4：《後漢紀》獨存群臣上書史料表	55
表 2-5：《後漢紀》獨存言論類史料表	56
表 2-6：《後漢紀》獨載史事表	57
表 2-7：《後漢紀》獨載人物行蹟表	59
表 3-1：東晉時期二體史籍著作表	71
表 3-2：《後漢紀》合傳表	75
表 3-3：《後漢紀》類傳表	76
表 3-4：《後漢紀》附傳表	77
表 3-5：《後漢紀》闕繫四時表	81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歷史文獻與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發展密切攸關，中國歷史文明發展早熟，自秦帝國一統政治疆域，往後中國的政治體系即在秦帝國所建立的輪廓基礎之下一脈發展，中國的歷史文獻也在崇史的文化特色下，隨政治發展成熟。（註1）

漢武帝時代，公元前一世紀初，太史公司馬遷以上承孔子、續修春秋為一己之使命，（註2）持念崇高，卻不守舊、盲從，展現出大史家的宏觀識見，有因革、知損益，創獲「成一家之言」，撰成曠古燦今的首部紀傳體史著——《史記》。《史記》出，紀傳體逐漸蔚為流行，成為後繼各家所仿效的對象，與過去記事採「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的編年史別為二體。（註3）

〔註1〕 中國自上古即是尊崇歷史的民族，史職、史官的發展甚早，古籍中屢見記載。關於中國史職、史籍與史學的源流和發展，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二刷）考之甚詳。另有湯勤福主編，《中國史學史》（太原市：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亦對中國史學的源流、發展脈絡敘述頗詳，可一併參閱。春秋以後，中國史學已逐漸趨向成熟，杜維運更直接宣稱，司馬遷《史記》的誕生：「中國史學，……已完全進入成熟的時期了。」參閱氏著《中國史學史（一）》（臺北市：杜維運，1993年11月），頁141～236。

〔註2〕 筆者此稱「春秋」是泛指「史著」。司馬遷上承孔子之意，參閱《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年6月二版十三刷），頁3295～3300。

〔註3〕 杜預謂《春秋》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異同也。」此乃編年體史著記事之通法。參閱《春秋左傳正義》（北

後漢末造，荀悅奉詔「抄撰《漢書》，略舉其要」，欲將錯綜的紀傳體內容存菁取要，乃「撮序表、志，總爲帝紀」，反改紀傳爲編年，「通比其事，列繫年月」，作一統整、簡化工程，整合在帝紀編年之中，使前漢一代歷史「省約易習」。^{〔註4〕}自此以後，原本沈寂的編年體史著，開始復甦而生，並且代有佳作，荀悅無意間爲往後魏晉南北朝復興的編年體開創了新的范式。^{〔註5〕}

漢末魏晉，歷史再次走入一個大變動時代，巨變的時代刺激了人的思維，活化了學術的興盛，凜然歷史的尊貴與威嚴，以史爲殷鑒、以史爲懲勸，史學極盛的時代因而誕生。^{〔註6〕}後漢雖亡，一代殷鑒不遠，魏晉間撰著後漢歷史的史家紛出，先後共計世出多少後漢斷代史著，今日已難查考確切的數字，退求今日可見作者、卷數明載於史籍者，仍可見及佚文輯本者，以及全書尙稱完整者，合有一十三家，^{〔註7〕}略列簡表如下（見表 1-1）：

表 1-1：書志中可見之後漢斷代史籍表

書名	作者	體裁	卷數	存亡	有無輯本
後漢書	〔吳〕謝承	紀傳體	《隋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 《舊唐書》：一百三十三卷 《新唐書》：一百三十卷（又《錄》一卷）	亡	存輯本

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十三經注疏本），頁 3。

〔註 4〕關於荀悅奉詔修改《漢書》原因，可參閱〔漢〕荀悅撰、張烈點校，《兩漢紀：（上冊）漢紀·漢紀序》（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頁 1~2。

〔註 5〕《隋書·志第二十八經籍二》列編年爲古史，所列部卷，除西晉初年所發掘之汲冢《紀年》屬東周戰國史籍，以及荀悅所著《漢紀》之外，共三十二部、六百二十四卷，後漢以降至南朝各代皆有，其中尚不包括「雜史」、「霸史」之屬以編年形式著作者。參閱《隋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 年 10 月初版五刷），頁 957~964。又劉知幾《史通·六家》謂：「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廣〕、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參閱〔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市：里仁書局，1993 年 6 月），頁 11。雷家驥從經史關係探求史意，謂荀悅修撰《漢紀》乃在簡約《漢書》，非爲重振編年古史，故爲紀傳史風下的一特例，參閱氏著《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0 年 10 月），頁 548。

〔註 6〕關於魏晉南北朝史學極盛的背景，可參閱杜維運，《中國史學史（二）》（臺北市：杜維運，1998 年 1 月），頁 1~43。

〔註 7〕《東觀漢記》爲後漢當朝史，亦是各家後漢史著最重要的史料底本，此處不列入魏晉南北朝時期後漢史著統計之列。

書名	作者	體裁	卷數	存亡	有無輯本
後漢記	〔晉〕薛瑩	紀傳體	一百卷（《隋書》錄殘本六十五卷）	亡	存輯本
後漢紀	〔晉〕張璠 〔註8〕	編年體	三十卷	亡	存輯本
續漢書	〔晉〕司馬彪	紀傳體	八十三卷（《新唐書》附又《錄》一卷）	志存	紀傳存輯本
後漢書	〔晉〕華嶠	紀傳體	《隋書》：九十七卷（殘本十七卷） 《舊唐書》：三十一卷 《新唐書》：三十一卷	亡	存輯本
後漢書	〔晉〕謝沈	紀傳體	《隋書》：一百二十二卷（殘本八十五卷） 《舊唐書》：一百二卷（又《後漢書外傳》十卷） 《新唐書》：一百二卷（又《外傳》十卷）	亡	存輯本
後漢南記	〔晉〕張瑩	紀傳體	《隋書》：五十五卷（殘本四十五卷） 《舊唐書》：《漢南紀》五十八卷 《新唐書》：《漢南紀》五十八卷	亡	存輯本

〔註8〕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張璠〕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閱〔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影印宋刻本），頁22。袁宏於〈後漢紀序〉中稱說其掇會諸家後漢書，張璠書為最後所見，致使後世學者以為諸家後漢史張璠所著最晚出。參閱〔晉〕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後漢紀·後漢紀序》（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年6月），頁1，與〔清〕黃奭，《黃氏逸書考·子史鈎沈·張璠後漢記》（懷荃室藏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210（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頁52。張璠事蹟《晉書》無載，生卒年與主要活動年代皆不詳。然查考《三國志》裴松之注曰：「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為官長，溥，鄱陽內史。」以文義釋之，張璠行蹟應早先或同時於虞溥、郭頒。又《晉書》載虞溥補尚書都令史時為尚書令衛瓘所器重，後「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同書衛瓘本傳，衛瓘於西晉武帝咸寧初年徵拜為尚書令，至太康初年遷司空。以史文比對，張璠當是西晉初時人。劉知幾列舉後漢以降眾編年史家時正置張璠於孫盛、干寶前。參閱《三國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年6月初版十三刷），頁133；《晉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年10月初版五刷），頁2139、1057；以及〔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六家》，頁11。正史經籍藝文志中，《隋書》置袁紀於張璠紀前，兩《唐書》則置張璠紀於袁紀前，或五代宋初史家已察覺《隋書》對張璠年代誤判而改易之。

書名	作者	體裁	卷數	存亡	有無輯本
後漢紀	〔晉〕袁宏	編年體	三十卷	存	
後漢書	〔晉〕袁山松	紀傳體	《隋書》：一百卷（殘本九十五卷） 《舊唐書》：一百二卷 《新唐書》：一百一卷（又《錄》一卷）	亡	存輯本
後漢書	〔南朝宋〕劉義慶〔註9〕	紀傳體	五十八卷（《隋書》無錄）	亡	無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	紀傳體	《隋書》：九十七卷 《舊唐書》：九十二卷（《後漢書論贊》五卷） 《新唐書》：九十二卷（又《論贊》五卷）	存	
後漢書	〔南朝梁〕蕭子顯	紀傳體	《隋書》：一百卷（亡佚）	亡	無
後漢紀	〔南朝梁〕張緬	不明	《梁書》：四十卷	亡	無

資料來源：筆者參引整理《隋書·志第二十八經籍二》、《舊唐書·志第二十六經籍上》（北京市：中華書局，1991年12月初版四刷）、《新唐書·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年3月初版五刷），與《梁書·張緬列傳》（北京市：中華書局，1995年3月初版六刷），並參照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頁74～75。

綜觀後漢諸史，多為紀傳體裁，雖然不知亡佚者幾何？恐怕亦相去不遠，蓋紀傳體已盛行多時，兼有表曆、書志可輔紀、傳為功。在汲冢《紀年》出土、杜預注解《春秋左氏傳》，以及干寶挾官方之勢，公然倡議編年之體，〔註10〕以至於編年體史著開始復興之際，紀傳體仍然是史家著史的主流選擇。

編年體於東晉南朝復興一時，後漢史亦出名家。袁宏（公元328～376年）〔註11〕聲稱：

〔註9〕劉義慶所著《後漢書》，《隋書》無錄，而《舊唐書·志第二十六經籍上》、《新唐書·志第四十八藝文二》皆載錄於司馬彪與華嶠之作間，可能非與《世說》作者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同為一人，此處存疑待考。

〔註10〕劉知幾《史通·煩省》：「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子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參閱〔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263。

〔註11〕袁宏生卒年源自《晉書·列傳第六十二文苑·袁宏》，頁2398，史文記載：「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而後學者皆視「太元初」即是「太元元年」，並無別議。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

對東晉中葉當時所見之各家後漢史著皆嘆爲糟粕，認爲各家後漢史著「闕略」、「不次序」、「錯謬」之病紛多，並且「疏外之意歿而不傳」、「遺風餘趣蔑如」，〔註12〕憂心忡忡、悵悵不快，意欲一正史傳著述之正途，遂撰成《後漢紀》三十卷傳世。

然而，編年體復興的盛況仍然受限於歷史發展局勢，當南朝紀傳、編年二體相互崢嶸之際，北朝則在官方主導控制之下，走向官修紀傳國史之途，終在隋文帝統一天下後，於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下詔：

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註13〕

中央政府正式下令關閉朝代歷史私撰之門，唐政權繼承禁令，並且積極主導修史，以杜絕民間私議。唐初官方動員大修六部史著，統以紀傳爲體，並且在編修的紀傳體書志中，正式區別紀傳、編年二體的主次地位，以紀傳體爲「正史」是尊，以編年體爲「古史」是次，如此一來，編年體於是再度受到抑制而沒落。〔註14〕後漢一代史著在以上背景發展之下，集前人之大成，並後附有司馬彪書志的范曄《後漢書》，逐漸一枝獨秀。唐初致力編修紀傳，促使正史系統的形成，范曄《後漢書》坐穩了後漢斷代的代表，甚而取代了《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列三史。〔註15〕

從此，後人論及後漢一代歷史，所引、所徵幾乎採輯能「包舉大端、委曲細事、總括遺漏」的范曄《後漢書》。〔註16〕其他眾家後漢書逐漸亡佚不論，

〔註12〕自「予嘗讀後漢書」引文以下，參閱〔晉〕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後漢紀·後漢紀序》，頁1。

〔註13〕參閱《隋書·帝紀第二高祖下》，頁38。

〔註14〕《隋書·志第二十八經籍二》分史部爲一十三，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參閱《隋書·志第二十八經籍二》，頁953～996。南北朝以降紀傳、編年二體的發展，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論之甚詳，參閱氏著《中古史學觀念史》，頁553～566。

〔註15〕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三國志四·三史》條：「唐宋以來學者恆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參閱氏著《十七史商榷》（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12月），頁309。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三史〉條：「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參閱氏著《十駕齋養新錄（附餘錄）》，收入《嘉定錢大昕全集》第柒冊（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頁147。

〔註16〕劉知幾謂紀傳體的優勢乃：「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

就如早范曄《後漢書》約七十年問世，僅與范書並傳於世的袁宏《後漢紀》，〔註 17〕亦遭後人忽視的舛厄命運。至北宋中葉，編年體再興的巨著——《資治通鑑》貫通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公元前 403～959 年），包羅了袁宏斷代編年的《後漢紀》，更完全掩蓋了袁紀的光芒。

從史料的角度而論，要探究後漢一代歷史，自當以《東觀漢記》為最接近後漢當代之最佳史料。然而《東觀漢記》早在傳抄過程中逐漸散佚，至今僅存輯本二十四卷，〔註 18〕僅賴《東觀漢記》已絕無窺得後漢史全貌的可能。魏晉南北朝撰著後漢史者雖多，然各家亦走上與《東觀漢記》相同的命運，各自散佚不傳，至唐盛世時，已至「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的殘局，〔註 19〕後漢的斷代史著唯剩存袁宏《後漢紀》與范曄《後漢書》完整傳世。

前述袁紀早於范書約七十年問世，所以《後漢紀》的史料等級較《後漢書》更接近於後漢時代，在探求後漢史時，實當重視袁紀的史料價值。然而一部長期被輕忽的史籍，雖然現今存本大致上完整，但是內容已有些許脫誤，而且其中的史事記載也與他書有諸多殊異。如何在《後漢紀》傳世千百年後的今日，從《後漢紀》的內容重新審定《後漢紀》對於後漢史的史料地位，是筆者撰寫此文的首要動念。

除此之外，一部史籍的誕生與流傳，對於民族史學文化發展的傳承與延續皆有其意義。袁宏編撰《後漢紀》在中國史籍編纂學與史學史上所蘊含的

志以總括遺漏，……洪纖靡失。」參閱〔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二體》，頁 28。

〔註 17〕袁宏《後漢紀》與范曄《後漢書》二書問世的相隔時間，趙國華謂：「歷代學者稱《後漢紀》的成書時間，較之《後漢書》早五十餘年，實際上不夠準確。筆者按：袁宏死於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後漢紀》已經完稿，而范曄死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後漢書》尚未完稿，其間相距整七十年。」參閱氏著〈荀悅《申鑒》的成書時間——兼論《後漢紀》的史料價值〉，收入鄧鴻光、李曉明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第一輯（武漢市：崇文書局，2003 年 5 月初版二刷），頁 156。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 376 年）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 445 年）相距六十九年，趙氏察之近矣！

〔註 18〕《隋書·志第二十八經籍二》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參閱《隋書》，頁 954。《東觀漢記》散佚與輯錄的歷史過程，參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序》（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 月），頁 5～10，以及〈敘例〉，頁 1～5。吳氏校注本改《四庫全書》本二十四卷為二十二卷，筆者此處仍取二十四卷。

〔註 19〕參閱〔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古今正史》，頁 343。

意涵，筆者希望在研究此文獻的過程，予以適當地彰顯，讓中國傳統史學發展史上的一頁更為清明，此乃意念之二。

史事、史家、史文的連結構成一部史籍的形成，史家從對史事的認知，經由其識見，對史事作成詮釋，再藉一枝史筆行文撰述。一部史籍所呈現的史事、史文之中，必蘊含史家所賦予的史「意」，「意」則源自史家的思想背景與識見層次，甚至可由史家的「意」中窺探史家所處的時代風貌。從《後漢紀》的內容，探求袁宏的思想意念，以期對《後漢紀》與作者袁宏的整體思想有更深層的認識，這是筆者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回顧

袁宏所撰著的《後漢紀》已傳世一千六百餘年，後人在研習後漢一代歷史時，袁紀雖不若范曄《後漢書》受人重視，然而這一千六百餘年來，仍然相繼有學者注意到這部史著的價值性，並且有研讀評析者、有整理校刊者、有提要申論者。種種前人學者研究成果，為袁宏《後漢紀》不斷增豐殘缺的羽翮，助使一部傳世千年的後漢史籍能在中國歷史文獻的瀚海中漸漸穩固它的價值。

欲進一步對袁宏《後漢紀》從事研討工作之前，過去前人學者埋首黃卷，孜孜矻矻所研究而獲的成果，應先期回顧與統整，探討前人學者研究，分析其著述立論的角度、要點。以下依序就《後漢紀》作者袁宏的行蹟學術考論、《後漢紀》的刊行、《後漢紀》的校讎、袁宏與《後漢紀》的史學、袁宏與《後漢紀》的思想等分述論之。

（一）袁宏行蹟學術考論

一部著作得以行傳於世者，乃源自於創作者所付出的精神心力，要瞭解一部史著當從創作者認識起。對於《後漢紀》作者袁宏的認識，可從袁宏的家世與其行蹟，以及袁宏的學術與著作兩大方向著手，以下就以此分以析述前人學者研究成果。

1. 袁宏家世與其行蹟

前人學者考述袁宏家世及袁宏生平行蹟，多依據《三國志》、《後漢書》、《晉書》本傳和《世說新語》諸篇與袁宏相關之記載，〔註 20〕一般引介者內

〔註 20〕學者述及袁宏家世、生平，一般平敘者多依據《晉書》本傳與《世說新語》，如周天游《後漢紀校注·前言》、〈袁宏（評傳）〉等文；但撰以考文者，除了

容無甚差異，筆者此處不予贅述。然而因為史文記載簡疏，若要對袁宏家世世系、生平行蹟詳細瞭解實有困難，故有諸位學者進一步對袁宏及其郡籍陳郡陽夏袁氏查考撰文，而且考述所獲見解有所殊異。

程章燦早先作有〈袁宏考〉考文，考論袁氏世系里籍及袁宏行蹟軼事，所徵文獻頗廣，其中最要者是對陳郡陽夏袁氏世系的考論，旁徵前人所疑、所徵，證述〈唐宰相世系表〉以來沿誤混以汝南汝陽袁氏世系的謬誤。（註21）楊曉菁學位論文〈袁宏之生平與學術研究〉一文亦考述了袁宏的家世，不過著墨不多、用力不深。

袁宏生平事蹟除了載於《晉書》本傳與散記於各志、傳之外，《世說新語》亦有十數篇相關記載，是認識袁宏最主要的資料來源。然而若僅就以上史料，仍然無法鋪陳袁宏一生行蹟的完整面貌，所以上述二文又於論文中考論袁宏仕宦歷程與交遊面向，欲使袁宏的一生行蹟能更為清晰。楊氏於程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探討，並且列出袁宏一生仕途概況表；而在袁宏的交遊考述，又以「薦舉者」、「賞其才者」、「知交者」三類分述，且徵引、著墨頗多，更清楚地呈現出袁宏入仕後的面貌。（註22）除以上二文之外，後又有張蓓蓓撰〈袁宏新論〉，對袁宏的仕宦歷程考論更為嚴謹，有不同於程、楊二氏的見解。（註23）

2. 袁宏的學術與著作

袁宏除了出身世族後裔、仕宦任官之外，他一生最重要的是身為一位學術性人物。《晉書》列其位於〈文苑列傳〉，傳中記載因作詠史詩，其辭「藻拔」，誦詩時巧遇謝尚，而為謝尚所賞識、一見如故。後又作賦、頌等各類文，創作量頗為可觀，史文載：

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

以各部正史為基準外，又廣加徵引其他典籍與碑刻銘文。

（註21）參閱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哈爾濱市：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35～160。程氏尚著有〈從「儒載運租」到「一時文宗」——東晉文學家袁宏及其創作〉一文，收入《古典文學知識》1993:4（總第49期）（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頁81～85，該文主要内容後融入前文為考述袁宏的一部份。

（註22）參閱楊曉菁，〈袁宏之生平與學術研究〉（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2000年6月），頁13～51。

（註23）參閱張蓓蓓，〈袁宏新論〉，收入氏著《魏晉學術人物新研》（臺北市：大安出版社，2001年12月），頁155～168。

百首，傳於世。〔註24〕

如此量產的一位創作者，在史、文鼎盛的東晉南北朝即已受到注目，當時政壇、文壇已然共推視其為「一時文宗」，〔註25〕可想見其文筆之佳、才情之高。

魏晉南北朝以降，由於文學、史學興盛，總類、總量堆累之後，除了影響目錄學的變化、總集類著作的誕生，也促使學術批評創作的興起。袁宏的創作與學術自然也為這些著作所收錄或評論。南朝梁劉勰評論袁宏文才，說道：「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指出袁宏因為為文創作的動機用意甚高，雖然作品卓越出眾，但也常伴隨偏差的缺失；另外又對袁宏多樣創作之一的「賦」體讚賞有加，謂曰：「彥伯梗概，情韻不匱」，慷慨的氣勢，使賦體的情韻得以傳意深遠，是魏晉一流的辭賦家之一。〔註26〕此外，同時的一位文學批評家鍾嶸列袁宏詩作於中品，並謂：「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適，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詩境風格不夠強勁，但是清新明暢、緊湊穩健則超越一般的詩作許多。〔註27〕

袁宏除了量產的文學作品，又涉略經、史，袁宏的著作保存最完整的是史籍《後漢紀》，一時文宗撰史，後人明黃姬水讚袁宏的史文：「渾深爾雅，一瀟江左之靡風」，意韻深長、質樸文筆比好華麗的魏晉文風更適合用於撰史。〔註28〕

近人的學術撰述方面，前述程章燦文校考了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文選》所錄此「贊」與《晉書》所載此「頌」，文多有異同。此外又考述袁宏其他著作與佚文，將袁宏生平的著作作了全面性的查考。〔註29〕

〔註24〕參閱《晉書·列傳第六十二文苑·袁宏》，頁2391~2399。除了文、史著作，正史中又錄《周易譜》，或稱《略譜》一卷，可參閱《舊唐書·志第二十六經籍上》，頁1969，與《新唐書·志第四十七藝文一》，頁1426。

〔註25〕參閱《晉書·列傳第六十二文苑·袁宏》，頁2391。

〔註26〕參閱〔南朝梁〕劉勰撰、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三刷），頁1828、300。

〔註27〕參閱〔南朝梁〕鍾嶸撰、古直箋，《鍾記室詩品箋》（臺北縣：廣文書局，1999年10月再版，影印隅樓叢書），頁21。然而明代的胡應麟對袁宏的詩作卻極是貶抑，謂：「晉人能文不能詩者袁宏名出一時，所存〈詠史〉二章吃訥陳腐可笑，當時亦以為工」。參閱〔明〕胡應麟，《詩數》（臺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9月，影印明崇禎五年重刊本），頁439。

〔註28〕參閱〔明〕黃姬水，〈刻兩漢紀序〉，收入《前漢紀三十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吳郡黃姬水刊本），頁2a。

〔註29〕參閱程章燦，《世族與六朝文學》，頁135~160。

楊曉菁〈袁宏之生平與學術研究〉是一部以袁宏為研究核心的學位論文，論及了袁宏對魏晉名士階段性差異的分期觀、袁宏的名教思想，以及袁宏的玄學與文學，含括袁宏的思想與學術。由於袁宏著作多已散佚，唯《後漢紀》大體完整，故楊氏於論述袁宏名教思想時，最能貼近袁宏一手史料，且著墨最多。反之，如袁宏所作《名士傳》已不可見，欲探索袁宏的魏晉名士分期觀，只能從時代背景與其他文獻佐以推論。其他玄學、文學由於殘輯的文獻有限，故能發揮論述的空間亦受其限制。（註30）

張蓓蓓〈袁宏新論〉亦詳論袁宏的學術，此文核心在析論袁宏著史中所蘊含的思想，由廣入深，從名教觀、以古喻今到史論思想與其內蘊，皆不離「思想」的範疇，從史著的面貌探討袁宏的思想，再進一步深探思想源流，是整篇論文的精髓。文末最後再述袁宏文學，篇幅蓋亦受袁宏文學作品資料保存不足所限。（註31）

（二）《後漢紀》的刊行

《後漢紀》問世於何年？實難查考其確切年代，然一千六百餘年前的史籍得以傳刊至今，實屬不易，歷來學者於刊刻《後漢紀》時，對於《後漢紀》的傳抄與刊行多有探本溯源的相關記載。

書籍的流傳，與書籍製作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中國古代文獻典籍在唐以前皆賴手抄，書籍珍貴無比。至雕版印刷技術發明，技術逐漸流傳，宋代以後印刷術進入黃金時期，影響所及遍及各類書籍。《後漢紀》今已不見唐代以前寫本，能追數所及僅自宋代以降各刊、寫本的發展。

現代白話盛行於世後，古籍刊本不便於閱讀，近人學者刊行《後漢紀》開始附標句讀，最早為王雲五所編刊的叢書與文庫本。《後漢紀》單獨刊行而且致力最深者，要數周天游的校注本，此本除了校勘史籍文字，又考訂史實，以注釋形式呈現，既盡可能保持原典原貌，又能讓讀者對照史實記載的異同，彰顯這部斷代史的價值。正文之餘，周氏蒐羅許多袁宏與《後漢紀》的相關史料附錄於書末，對研讀袁宏《後漢紀》的讀者提供甚是便利的文本。然而《後漢紀校注》最大的缺憾在於其印行前校稿疏略，書中魯魚亥豕不可勝數，這對於一部史籍校讎工程的著作而言實是抱憾的敗筆。

最近刊行問世的是張烈點校本，以最早的黃姬水刻本為底本，廣用各本

〔註30〕參閱楊曉菁，〈袁宏之生平與學術研究〉。

〔註31〕參閱張蓓蓓，〈袁宏新論〉，頁168～229。

參校，並吸收歷代學人校勘的成果。張氏爲了彌補史籍脫誤所造成的文理不順，以及史實記載的失誤，引用正史內容加以校正，是史籍點校中的精本。張烈點校本與周天游校注本的史文句讀多有歧異，句讀不同，史文文義便有所不同。此外，二氏對於史文的訛、脫、衍、倒詮釋見解亦有多處差異，故所校改亦有不同。

（三）《後漢紀》的校勘

歷代學人對於《後漢紀》的校勘形式約可分爲刊版校勘、讀書筆記與學術論文三類。學人刊版《後漢紀》同時致力於校勘，清初蔣國祚刊行《兩漢紀》取諸本互校，並臚列字句異同於卷末，是《後漢紀》校勘的濫觴。清季陳璞有感蔣氏校本不盡完善，於是旁引諸史籍、史注再校，並合果親王和陳澧所校成果得《兩漢紀校記》。（註32）

周天游校注《後漢紀》指出以袁紀校范書，可訂正范書時間之誤、訂正范書地名之誤、訂正范書諡號之誤、訂正范書職稱之誤、訂正范書史實之誤，並將條條成果展現在勤力地校改與注文上。周氏還指出袁紀保存諸多范書所未取，甚至原籍已經亡佚的史料，清惠棟正是廣取材於袁紀而在《後漢書補注》有諸多斬獲。最後，周氏還輯錄了《後漢紀》佚文七條於該著附錄中。張烈點校《兩漢紀》史文依作者自訂凡例校改，並於每卷後附校勘記，讀者能清楚知道作者更改史文所依所據。

除了以上學人刊版《後漢紀》時亦從事校勘，或另立冊卷、或附記於史文之外，另有學者閱讀《後漢紀》後條列讀史校勘成果。清季學海堂重刊史籍，林國贊撰〈重刊兩漢紀跋〉，雖名爲跋，就內容而言實是一篇校勘記，例舉諸多漢史編年與紀傳並存的價值。（註33）鈕永建又在蔣校、陳校基礎上再校《兩漢紀》，並撰成《兩漢紀校釋》六卷，其中《後漢紀校釋》三卷。（註34）鈕永建校釋與蔣國祚字句異同考、陳璞校記可並稱爲清代《後漢紀》校勘的三要著作。

〔註32〕周天游《後漢紀校注》中載陳澧有遺稿〈讀後漢紀〉，注文中並多次引用，筆者行文至此尚未獲見。

〔註33〕參閱〔清〕林國贊，〈重刊兩漢紀跋〉，收入《中國歷代書院志》之〔清〕陳澧、金錫齡選編《學海堂四集》（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影印清光緒十二年啓秀山房本），頁645～649。

〔註34〕參閱〔清〕鈕永建，《後漢紀校釋》，收入溥良輯《南菁札記》冊三（清光緒二十年江陰使署刊本）。